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59

罗贯中和
《三国演义》

沈伯俊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59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 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 俊

张国星

林 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 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 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59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沈伯俊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沈伯俊等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14-2

I. 罗… II. 沈… III. ①《三国演义》评论—中国②罗贯中(约1330~约1400)—文学评论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4764号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沈伯俊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5千字 印张: 3 $\frac{1}{4}$ 插页: 2

印数: 1—8,000册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颖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014-2/I·1752

本册定价: 6.00元 总定价(全100册): 600.00元

目 录

-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1
- 二、罗贯中的生平与著作/11
- 三、《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15
-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22
- 五、《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28
 - (一)理想的典范——诸葛亮/28
 - (二)“奸雄”的典型——曹操/39
 - (三)“忠义”的化身——关羽/47
 - (四)绚丽多彩的人物画廊/55
- 六、《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63
 - (一)创作方法与总体风格/63
 - (二)千变万化的情节艺术/66
 - (三)波澜壮阔的战争描写/73
 - (四)宏伟严谨的结构艺术/77
 - (五)简洁明快的语言艺术/81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七、《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87

(一)对文学艺术的影响/87

(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91

(三)《三国演义》在国外/95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1)它问世已经六百多年,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2)它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将近一千人,这在所有古典小说中位居第一;(3)根据它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肯定第一;(4)与它有关的名胜古迹分布于全国大约二十个省、市、自治区,总数多达数百处,其他作品简直无法望其项背,这又是第一;(5)与它有关的传说故事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同样是第一;(6)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广泛与深远,它无疑也是第一。它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名著之林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从公元220年曹丕建立魏国到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仅有短短的六十年,加上此前的汉末时期(从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到220年曹丕代汉),总共也只是一百余年。然而,这一时期在

整个中国历史上却影响极大。首先,这是一个由朝政腐败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发展到三国鼎立,再实现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期。在尖锐激烈、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涌现出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一大批富有文韬武略的优秀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他们的功业与作为,在整个中国史上写下了十分精彩的篇章。其次,这是一个承先启后,思想解放,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在政治制度、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再次,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中原地区一直由汉族占据统治地位。而这一时期结束之后仅仅十一年,即公元291年,腐朽的西晋统治者内部便发生“八王之乱”,不久,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导致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相继建立,然后是南北朝的长期对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近三百年;直到隋朝统一南北,才重新恢复汉族在全国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三国时期的历史是汉族单独统治中国的终点和少数民族建立中原统治政权的起点。两汉盛世在此时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在此后开始。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交流与融合,从此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这一划时代的巨变,对广大民众心理的震撼极为

深刻。因此,从东晋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三国时期便成为文人学士和广大群众特别关注的一段历史。

最早系统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是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2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由于马谡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也受到惩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他曾师事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蜀汉灭亡,西晋建立后,陈寿曾居家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收集整理魏、蜀、吴三国史料,并参考在他之前写成的一些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晋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魏国君主均立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

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惩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严谨,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没有采用,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字数几乎相当于《三国志》的三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往往能够以事见人,情趣盎然。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却无具体事例；裴松之便注引《曹瞒传》中关于曹操“装病诬叔”的记载予以补充，使曹操的“有权数”、“放荡”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武帝纪》记曹操年轻时，太尉桥玄很赏识他，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对曹操的正面肯定和极高期望；裴松之又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记载：“尝问许子将（即许劭）：‘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又是对曹操的能力和品格的更深刻的评价，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曹操。《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曹操出场时，罗贯中把这两条注释都用上了，使曹操的为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和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除了《三国志》和裴注之外，有关汉末三国历史的重要史书还有《后汉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

《后汉书》由南朝宋史学家范曄（398—445）在前人已有的史料基础上编纂而成，是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有关汉末的史料，此书所载较为全面；一些重要人物，如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刘焉等，此书和《三国志》中均有传，而叙述往往比《三国志》详细一些

(但裴松之注中的一些材料,《后汉书》又没有涉及);另外一些人物,如何进、皇甫嵩、孔融、祢衡、左慈等,则仅此书有传。因此,《后汉书》与《三国志》和裴注可以互相印证补充,给后人提供有关汉末人物和事件的更丰富的史料。

《华阳国志》由东晋史学家常璩编撰,记述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一部分)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中有关蜀汉的史料,往往可以补《三国志》之不足。例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写道:“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记载了刘备初闻曹操之言的惊恐。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补充道:“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则记载了刘备的随机应变。这样,就为《三国演义》写《煮酒论英雄》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它的长处在于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迹,便于了解事件的过程。比如对于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三国志》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使人难以全面把握战役的始末。《资治通鉴》集中加以叙述,给人的印象就完整得

多了。此书的编年体形式,对《三国演义》的成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史传系统之外,文学艺术,特别是通俗文艺,对三国历史也一直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早在魏晋时期,在陈寿的《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若干关于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南北朝时期,有关汉末三国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日益增多。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其中就有一些传闻故事,如曹操“借头欺众”、诸葛亮“空城计”、“死诸葛亮走生仲达”等。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三国逸闻故事,如《搜神记》中的“麋竺路遇火神”、“丁吉祈雨”,《语林》中的“曹操诈称梦中杀人”、“曹操床头捉刀”,《世说新语》中的“望梅止渴”、“管宁割席”、“曹植七步作诗”、“钟会‘汗不敢出’之对”,等等。

从隋唐起,三国故事成为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如《大业拾遗记》中的《水饰图经》条,记载隋炀帝曾与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浮在水面上的各种木刻造型),其中就有“曹瞒浴谿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造型,表明隋时三国故事已经广泛流传,并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唐代许多诗人都有咏怀三国之作,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这样两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这时三国故事流传更加广泛,连儿童也相当熟悉。

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各种通俗文艺都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三国题材作品。戏曲方面,当时的“院本”已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剧目;影戏中也有三国戏,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一书中的“影戏”条说:“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同时,宋代“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三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颧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北宋末期,出现了霍四究等著名的“说三分”专家,深受观众喜爱。

元代的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戏曲方面,元杂剧中的三国戏相当丰富,我们今天知道的剧目就有将近六十种之多。元代许多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武汉臣、王仲文、尚仲贤、李寿卿、石君宝、金仁杰、郑光祖等,都创作过三国戏。这些三国戏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以诸葛亮、关羽、张飞、刘备等刘蜀方面人物为主角的剧目占全部三国戏的一半以上;即使是写其他人物的,也普遍表现出“尊刘贬曹”的思想倾

向。第二,题材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故事,有的题材虽有历史依据,也已经过作者的幻化变异,与史实大相径庭。第三,艺术表现力强,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流畅,富有感染力。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高文秀的《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郑光祖的《虎牢关三战吕布》,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小说方面,元代出现了汇集“说三分”成果的长篇讲史话本,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有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二者内容、风格基本相同,实为同一书在不同时间的两个刻本,因而可以《三国志平话》为代表。《平话》共约八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大体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了三国故事。其中许多情节,或直接取自民间传说,或由艺人任意想象虚构;一些史书上有所记载的故事,经过艺人的改造,已与史实相距甚远。全书叙述简略,文字粗糙,不少地方缺乏必要的交代和衔接,可见它原是“说话”艺人讲说三国故事的底本;但它每页均为上图下文(上面三分之一的空间是插图,下面三分之二的空间是文字),看来又是可以供人阅览的读本。从总体上看,《三国志平话》第一次将众多的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简率的雏形。

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

二、罗贯中的生平与著作

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至今知道得不多。明代人有关他的记载极少，彼此还有一些出入。其中最受人重视的是《录鬼簿续编》的一段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戏曲作家贾仲明。他生于1343年，至正甲辰（即至正二十四年，1364）曾经与罗贯中“复会”，当时他二十二岁（虚岁），四年以后，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就灭亡了；罗贯中既然是他的“忘年交”，年龄至少应该比他大二三十岁以上，那么，罗贯中的生年大约在1320—1330年左右，如果按享年七十岁计算，其卒年大约在1390—1400年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也有人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无名氏，即使是这样，罗贯中仍然是这位无名氏的长辈，其生年应在元代中、后期，其卒年也应在明初。我们说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作家，根据就在这里。这样，《三国演义》当

然就成书于元末明初了。

根据一些早期《三国演义》版本的题署和明代学者郎瑛的《七修类稿》、高儒的《百川书志》、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的记载,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字。关于他的籍贯,明代以来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太原”(今山西太原)、“杭州”或“钱塘”(均指今浙江杭州)等几种说法。“东原”说的主要根据,一是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叙述,二是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早期《三国》版本的题署;“太原”说的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杭州”说的主要根据是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和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的记载;“钱塘”说的主要根据则是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的记载。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把《录鬼簿续编》的记载视为理所当然的“铁证”,因而“太原”说成为主流观点。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种种质疑,认为“东原”说更为可信。(参见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一文,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日前,“东原”说与“太原”说仍在争论之中,尚未形成定论。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可靠的文献极其难得。有的学者发现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文集》卷首有一篇《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门人名单中有一个“罗本”,认为他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的学者还进一步依据门人之间“序齿”